

观念上的调整

Jian-Ye Wang和Abdoulaye Bio-Tchané的“非洲和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本刊2008年3月号）提供了针对中非经济关系值得称道的归纳。作者对日益加强的国内政策提出了6条建议，这从理论上讲能使非洲从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获得最大利益。



然而，在关注政策领域的同时，也必须关注非洲领导层是否存在观念上的转变。例如，贵刊作者建议要“防止不可持续债务的累积”时，却没有论及造成这种债务累积的（不太明显但却更危险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这一事实。

一些政治家认为有必要对与项目相关的投资设定一个百分比，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应对贷款封顶。有关需求管理和促进出口的国内政策存在种种缺陷；政府不顾国家的偿还能力去举债；名目众多的项目变成了徒劳无功的大包袱。这些因素反映出人们对部分非洲决策者不负责任的感觉，这使我们不难理解非洲为什么存在一方面负债累累，一方面又不发达这种怪现象。

非洲的决策者必须明白，如果他们想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受益，必须摆正自己的态度。正如非洲年轻人需要注射破伤风疫苗一样，非洲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个“观念调整计划”。

Hippolyte Binazon
组织管理顾问
贝宁，科托努

他们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家？

最近几年，我觉得《金融与发展》与其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能够感受到的变化。贵刊向读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针对客观事件的报道，同时还提供了许多有关当代经济学思潮的主要情况的资料。我特别欣赏“经济学人物”栏目，它刻画了在理论与实证上对当代经济学思想的巨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群活生生的作者的形象。

你们把刻画的重点聚焦于像阿马蒂亚·森、V.L.史密斯、罗伯特·蒙代尔、马丁·费尔德斯坦、保罗·克鲁格曼、约翰·泰勒以及罗伯特·巴罗这样的理论上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其他人则是经济决策者。我对宏观经济学家、决策者（例如奥托玛·伊辛、黑田东彦、艾利斯·瑞夫林）和诸如赫尔南多·德·索托等“实践”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尤其感到好奇。在对现代经济科学的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趋同现象进行了30年的探寻之后（一些重要的研究规划成为这种探寻的开路先锋），“宏观经济学

家”这一称呼是否还有意义？

还有，在Prakash Loungani对约翰·泰勒的采访（本刊2008年3月号）中，作者告诉我们，A.W.菲利普斯假设通货膨胀的水平与失业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据我所知，菲利普斯的理论是取代了通货膨胀率的相对变化与失业之间存在关系这种假设（菲利普斯曲线）。

Mahnoud Abdelmoula
发展与国际合作部
突尼斯，突尼斯城

泰勒的成就

关于约翰·泰勒的文章既引人入胜，又启人心智。作者向我们展示出，泰勒的著作远远超过了弗里德曼。但就提出一个体系并在美联储引起持续反响这一点而言，事实上泰勒只不过是步与弗里德曼相同结构逻辑的后尘。

泰勒给予经济学学生的忠告似乎给我这样一种直觉：如果这种忠告是在非常拥挤的非洲演讲大厅里提出的，那么，要想不仅使学生们受到启迪，而且还要点燃这里井然有序的氛围，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泰勒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完全有能力尝试为基金组织的改革提出指导意见，并能够坦言非洲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Brice Agonvonon
贝宁

从危机的根源上推动投资

“次级债：一次危机的触痕”（本刊2007年12月号）清晰地描述了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真相。在这次危机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抵押贷款问题，而很少论及信用违约互换、对有担保贷款的义务以及其他杠杆结构的问题。对后面的结构问题缺少关注的原因想必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很难对其加以解释（毕竟，即便银行和此类工具的其他持有人也难以对其做出评价）。你们的目的是提醒我们，正是杠杆作用而未必是次贷环节中与日俱增的违约率对当前的危机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如果把流动性过度与追求高风险的投资者等因素也加进来，那么，“火灾”肯定会发生。

不幸的是，用建章立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尽管管用，但来得较迟。到那时，管理者可以尝试使用新一代的金融工具。

Manuel Pereyra
Penta Estrategia & Inversiones战略副总裁
智利，圣地亚哥

